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冰心作品集

一九八八年

冰心作品集



1988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目 录

1988 年

一代伟大的女性

——记邓颖超大姐 (2)

话说龙年 (5)

多一点自己的儿童电视剧 (6)

话说短文 (9)

序《天上人间》 (11)

哀悼叶老 (12)

海棠花下

——和叶老的末一次相见 (14)

致巴金 (3月1日) (16)

病榻呓语 (17)

《为孩子们呼喊》序 (19)

为赵紫宸先生百年诞辰题词 (21)

英译自选小说集《桥》序 (22)

介绍《小帆的灯》 (24)

《女大学生抒情散文百篇》序	(25)
致黄安榕 (4月26日)	(26)
远来的和尚.....	(28)
介绍我最喜爱的两篇散文	(32)
落价	(37)
致宫玺 (5月23日)	(40)
致王安忆 (5月30日)	(41)
我感谢	
——《人民日报》创刊40周年感言	(42)
致巴金 (7月13日)	(45)
致宁民庆 (7月22日)	(46)
《赵朴初诗词集》序	(47)
致巴金 (8月3日)	(49)
干涉	(51)
致宫玺 (9月8日)	(57)
题赠刘金涛	(58)
我呜咽着重新看完了《国殇》	(59)
致巴金 (9月27日)	(62)
致宫玺 (9月27日)	(63)
《冰心读本》序	(64)
致陈玟 (10月2日)	(65)
喜读《炎黄子孙》	(66)
为首届“我看中国”国际青少年征文作品选	

题词	(67)
致陈筠 (10月13日)	(68)
关于男人 (之七)	
九 追忆吴雷川校长	(69)
致巴金 (10月24日)	(72)
养猫	(74)
痴人说梦	(76)
一颗没人肯刻的图章	(78)
致宫玺 (11月7日)	(80)
致葛翠琳 (11月7日)	(81)
致王安忆 (11月13日)	(82)
无土则如何	(83)
郑振铎	(88)
一个充满了力量的汉字	(89)
埋在记忆最底层的一本书	(93)

1988 年

一代伟大的女性

——记邓颖超大姐

世纪同龄人的我，在八十八年的漫长岁月里，经历过若干朝代，多少沧桑，可谓“阅人多矣”，而能在我心头始终爱戴不渝的，只有周总理和邓大姐这一对模范夫妻的崇高印象！

1966年8月，我的朋友老舍先生，在遭到红卫兵的毒打，遍体鳞伤，抬回家里，他的夫人胡絮青伤心饮泣地替他擦洗伤处的时候，老舍对她说的最末一句话，是：“总理是最了解我的！”

1976年2月，我的朋友巴金在致静如的信中，说：“总理逝世，全国一致哀痛，比丧失亲人还难过，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我和总理接触较多，回忆起来，他真是个完人。他的人格太伟大了。”

我在《我的老伴——吴文藻》一文中有：“1958年4月，文藻被错划为右派，这件意外的灾难，对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正在这时，周总理夫妇

派了一辆小车，召我到中南海西花厅那所简朴的房子里……我一见到邓大姐，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把一腔冤愤，都倾吐了出来……”

1987年，在《人民文学》第十二期上，我的朋友赵清阁女士，又以《亲人》的题目，写了一篇很长的散文，描述了邓大姐和她“亲人”般的情谊和“邓大姐对国内外文艺工作者都很关心……”的许多事迹。

以上只是讲了最近我所看到的，文艺界朋友们见于文字的、关于总理和邓大姐的思念和评价。其实，在五洲四海凡是和总理、邓大姐有过接触的外国人士，又何尝不是以同样的“伟大”和“崇高”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他们的人格呢？

尤其是和我谈过话的外国朋友，都认为邓大姐是位心胸最广阔、思想最缜密、感情最细腻的女性，而且她的思想和感情都完全用在她的工作和事业以及在她周围人们的身上。她是最理解、最关怀、最同情一切人、是把爱和同情洒遍了人间的一代伟大女性！

如今姑且说一段我自己的经历：邓大姐十分爱花。不但自己种植也爱看别人种植的花。北方玫瑰花公司知道邓大姐的爱好，每到花开时一定请她去看花。1986年他们也用车来接了我去。邓大姐和我一同在花圃里照了相。邓大姐还带来一大把她自己院子

里的白芍药花送给我。我回家后就把这一束花插在我客厅里总理像前的瓶子里，我心里默默地祝祷说“这是您家里的花，又供养到您面前来了。”

去年，又是玫瑰花时，北方玫瑰花公司仍旧请邓大姐去赏花，我却因为赶一篇文章，没有去成。不料邓大姐看见我没有去，又知道这花园离我家不远，便要来看我。二十分钟前我才得到消息，我十分惊喜，又知道她住惯了平房，我家是在二楼、她上楼步履一定艰难，我扶着助步器，在房门口看见邓大姐由两位人员搀扶着迟缓地上了楼，我真是十分过意不去！我们就在客厅总理像前坐了下来，谈了半天，就又由赵炜同志等人簇拥着她下了楼，我又只能在房门口站着送她……

她的这次“光临”，使得我的第二代、第三代人都兴奋异常。我的年轻的朋友都为此感到荣幸。我又何尝不感到荣幸呢？但我知道，得到邓大姐的爱护关怀的人还有许许多多。我只是其中之一！

1988年1月12日晨

（本篇收入《邓颖超——一代伟大的女性》，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年4月初版。）

话说龙年

龙年到了。

《民进》的声音也该腾飞了！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员绝大多数是教育和文化出版界人士，对于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说法，都从心底里感到振奋和鼓舞。我看了 1987 年 12 期的《民进》上头版头条刊登的“贯彻十三大精神要加快教育改革”这篇文章里，每一位参加座谈的校长和教师的发言，都是语重心长，切中时弊。为了事关国家和民族的百年大计，我认为这篇座谈可以抄呈国家教委作为教育改革执行细则的参考。民进广州市委的座谈记录，也可以附去。别忘了我们民主党派既享有“长期共存”的权利，就应该尽到应尽的“互相监督”的责任！

（本篇最初发表于《民进》1988 年第 2 期。）

多一点自己的儿童电视剧

我有时不可避免地要看一些儿童电视剧，因为我身边常有些孩子到时候就打开我的电视机，拉我同他们一起看。可是孩子们也常抱怨说“儿童电视，尽是些外国的动画片，为什么我们自己的那么少。”我也总希望有一些让孩子们看了又有趣，又接近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又有教育意义的电视剧满足他们的需要，可是我又不会写！

我终于得到了一部获得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的儿童电视剧本——《好爸爸，坏爸爸》，这题目就引起了我的兴趣。本来爸爸和妈妈在孩子的心目中，有时是“好”的，有时是“坏”的，而且孩子的“好”、“坏”的道德标准，也和成人的大不一样。

我把这剧本看了两遍，越看越觉得这里的人物，男、女、老、幼，都是活生生的，从生活中来的，而且都是非常“亲切”得可爱。

剧里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

爸爸是建筑设计工程师，妈妈是国际航班的空中服务员。因此这个剧中的主人公——点点的上学、备课以及家务等等都堆到了正在筹划一张国际设计大奖的爸爸身上！

点点是一个聪明调皮的孩子，刚上小学，爸爸必得一边管家务，做饭，洗衣，一边送孩子上学，督促他的功课，一边做些建筑设计，在爸爸心烦、点点淘气的时候，不免打他几下，在爸爸感到不该因自己心烦打孩子而“内疚”时，又加意抚慰着孩子，这些情况，在本剧开头的歌声中，就唱出来了：

“我有一个好爸爸，好呀好爸爸，
做起饭来当当，洗起衣服嚓嚓，
高兴起来哈哈，打起屁股啪啪
……
打人也是好爸爸，好呀好爸爸！”

这个剧里还有许多人物，如有多年教学经验的陈老师，十分地理解如何诱导孩子；也有刚从大学毕业的女李老师，专心尽职，却不大了解儿童心理。有一段对话，李老师问道：“……偏爱一个学生不能算是一个好老师吗？”陈老师脸上仍笑吟吟地说：“可做为老师更可怕的是偏见。”还有爸爸的上司杨总一对

老夫妇，他们会收留点点的受伤的猫，还劝爸爸不要丢掉练习提琴，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因为我自己的儿子也是一个学建筑的，我对这两句话特别熟悉。

这剧里还有慈祥的邻居田奶奶和她的小孙女丫丫，有点点的桌友陈晨，还有民警、理发员，有女记者……动物里有蝥蝥，有猫，从这里面引出许多故事，反正热闹得很。

总之，这剧里人物很多，各人有各人独特的形象，语言，思想，举止，都是从生活中来的，剧中出现许多有趣的画面和精彩的语言，不能一一介绍了。

我听说这剧本已在拍摄了，等儿童电影制片厂上映的时候，我请小朋友们、请你们的爸爸妈妈去看，或者做父母的带你们的孩子们去看，都会感到有意思，而且会受到教育！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88年2月6日。）

话说短文

也许是我的精、气、神都不足吧，不但自己写不出长的东西，我读一本刊物时，也总是先挑短的看，不论是小说、散文或是其他的文学形式，最后才看长的。

我总觉得，凡是为了非倾吐不可而写的作品，都是充满了真情实感的。反之，只是为写作而写作，如上之，为应付编辑朋友，下之，为多拿稿费，这类文章大都是尽量地往长里写，结果是即便有一点点的感情，也被冲洗到水分太多、淡而无味的地步。

当由一个人物，一桩事迹，一幅画面而发生的真情实感，向你袭来的时候，它就像一根扎到你心尖上的长针，一阵卷到你面前的怒潮，你只能用最真切、最简练的文字，才能描画出你心尖上的那一阵剧痛和你面前的那一霎惊惶！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有写短文的文学传统的。那部包括上下数千年的《古文观止》，“上起东周，下迄明末，共选辑文章 220 篇”，有几篇是长的？如杜牧的《阿房宫赋》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等等，哪一篇不是短而充满了真情实感？今人的巴金的《随感录》，不也是一个实例吗？

1988 年 1 月 30 日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88 年 2 月 14 日。）

序 《天上人间》

我深深地知道这本集子里的每一篇文章，不论用的是什么文学形式，都是用血和泪写出他们最虔诚最真挚的呼号和呜咽。

因为这些文章所歌颂哀悼的人物是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总理是我国二十世纪的十亿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

冰 心泪书

一九八八年一月三十日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88年3月4日。）

哀悼叶老

我是2月1日因发高烧住进了北京医院三楼。烧退了又起来，糊里糊涂地过了一个星期。清醒后有民主促进会的同事们带着礼物来慰问，说是雷洁琼和赵朴初都住在四楼，叶圣陶老人住在一楼。叶老是民进的名誉主席，雷洁琼是主席，赵朴初和我都是副主席。大家都笑说，“民进中央搬到北京医院来了。”

雷洁琼是小病，赵朴初总是以医院为避客的地方，常常住院，还带了许多线装书和纸笔，来读书写字。我们三人还彼此写打油诗讲笑话。

我只惦念着叶老，据说他老人家是肺炎，但不发烧，而且心肌梗塞。我心中不安，大夫们一到我病房，我总问叶老怎样了？大夫们总说“还平稳”。我很熟悉并且了解大夫们的“语言”，他们总是尽力宽慰病人的，若是不说“好多了”，情况就是不大好，我听了就默然……

我是2月15日下午出院的。

16 日夜，我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联播，忽然听到播音员清朗的声音“政协副主席，民进名誉主席……”我没有听完就知道底下是什么了！我的眼泪涌了出来……

眼前一座大山倒了，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大地！

1988 年 2 月 24 日黄昏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88 年 2 月 28 日。）

海棠花下

——和叶老的末一次相见

好几年以前，圣陶老人就约我去他家赏海棠花了，但是每年到了花时，不是叶老不适，就是我病了，直到去年春天，才实践了看花之约。

那天天气晴朗，民进中央派来了两辆小车和一位同志，把我和女儿吴青一家（因为他们一直是和我同住）接到叶老家去。我的女婿陈恕，带了一架录像机，我的外孙陈钢，带了一架照相机，兴冲冲地我们一同上了车。

到了叶家门口，至善同志已在门口欢迎了。我扶着助步器由吴青他们簇拥着进了这所宽大整洁的四合院的外院，又进入了内院，叶老已经笑容满面地从雪白的海棠花树下站了起来。老人精神极好。我们紧紧地握手，然后才仰首看花，又低下头来叙谈。这时

录像机和照相机都忙个不停，我女儿吴青却抱起叶老旁边的一只卷毛的小黑狗，抚摸着，笑着说：“这小狗真乖。”

我们又从花下进入了堂屋，屋里摆设得十分雅致，房屋隔扇框里也都有书画。我有好多时候没有见到过这样精致的真正的北京四合院了！

至善指点着叶老宽大的卧室墙上一张叶老夫人的相片，说：“这是他们结婚后七个月照的。”我笑着同至善说：“那时候还没有你呢！”大家都笑了。

时间过得真快，我向叶老献上我带去的一个小月季花篮，叶老还赠我一个很精美的小黑胆瓶，里面插着三朵他们花圃里长的三支黄色的郁金香。

回家的路上，我捧着那个小胆瓶，从车里外望，仿佛北京城里处处都是笑吟吟的人！

1988年2月29日清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88年3月4日。）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昨天收到你送我的《随感录》，尤其是上面的那几张相片，十分感动。我又大致翻了一遍。

这次二月初的发烧，住院两个星期，回来后精神不好，由于叶老和我同时住院，他逝世了，心里很不好过！我又想，有生必有死，是个规律，反正叶老是不朽的！

回来后被吴青软禁了，不准见客，也好。你如何？小林等好吗？告诉棠棠，他的创作大有前途，我十分欣赏。

祝你

安好！

冰 心

三、一、一九八八

病榻呓语

忽然一觉醒来，窗外还是沉黑的，只有一盏高悬的路灯，在远处爆发着无数刺眼的光线！

我的飞扬的心灵，又落进了痛楚的躯壳。

我忽然想起老子的几句话：

吾有大患，及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这时我感觉到了躯壳给人类的痛苦。而且人类也有精神上的痛苦：大之如国忧家难，生离死别……小之如伤春悲秋……

宇宙内的万物，都是无情的：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春往秋来，花开花落，都是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只在世界上有了人——万物之灵的人，才会拿自己的感情，赋予在无情的万物身上！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种句子，古今中外，不知有千千万万。总之，只因有了有思想、有情感的人，便有了悲欢离

合，便有了“战争与和平”，便有了“爱和死是永恒的主题”。

我羡慕那些没有人类的星球！

我清醒了。

我从高烧中醒了过来，睁开眼看到了床边守护着我的亲人的宽慰欢喜的笑脸。侧过头来看见了床边桌上摆着许多瓶花：玫瑰、菊花、仙客来、马蹄莲……旁边还堆着许多慰问的信……我又落进了爱 and 花的世界——这世界上还是有人类才好！

1988年3月15日清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88年5月15日。）

《为孩子们呼喊》序

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妇女》编辑部编了一本《为孩子们呼喊》。这是一本好书。我愿意把它推荐给所有的孩子们的父母和少年儿童教育工作者。这本书里面有当代教育家、作家、社会活动家叶圣陶、巴金、夏衍、柯灵等写的关于青少年儿童教育的文章，也有约请专家、学者分别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写的关于教育孩子的文章。此外，还有一大批关于教育孩子的调查报告和典型事件材料，也有孩子们自己的呼声。内容涉及面广，有理论的深度，也有丰富的经验；有些文章还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欣赏。我相信，广大的家长和老师们，一切关心孩子教育的同志们，一定会爱读这本书的。

近患腰痛，不能久坐，匆匆数语，不尽万一。

冰 心扶病书

1988 年 3 月 30 日午

(《为孩子们呼喊》，北京日报出版社 1988 年 8 月第 1 版。)

为赵紫宸^①先生百年诞辰题词

赵紫宸院长是一位
慈蔼温和的长者
博大精深的学者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我们学习他就是对他
百年诞辰的最好纪念

冰 心扶病书

戊辰仲春

（本题词最初刊登在《纪念赵紫宸先生诞辰百周年座谈会文集通讯》1988年12月第18期。）

^① 赵紫宸，1888年生，浙江德清人。1914年被选送到美国万德比尔特大学社会系学习。1917年回国，在东吴大学任教。1926年应聘为燕京大学教授，后任宗教学院院长。1932年后赴英、美、荷、日、印等二十多个国家进行讲学和教会活动。作品有诗词五千余首，出版了《南冠草》、《玻璃声》。著有《耶稣传》、《基督教哲学》等多种。

英译自选小说集《桥》序

外文局文学出版社要出一本我的小说英译选集，让我作序。估计起来，在我七十年写文章的生涯中，我写的散文的确比小说多，现在只好就选出的几篇小说来说一说。

我觉得我写小说时的心情，大概经过甜、酸、苦、辣四个时期。

从《超人》前后到《第一次宴会》那个时期，我的生活一直是在快乐融洽的心情中度过的。这以后我从周围的事物中感到了世态人情中有很浓厚的压抑的“酸”的一方面，我写了《分》和其他的几篇。1957年以后的“反右”和“十年动乱”是“苦”的时期，我只写了一篇《记一件最难忘的事情》来倾吐我心中的哀愤。再往后我写过一篇《空巢》以及最后的一篇《万般皆上品……》，那是我满含着心中的辛辣写的。国家是欣欣向荣地“向前看”了，却还有些青年人是“向钱看”的。他们“向钱看”的原因和手段

却都不相同，我听到看到的够多的了，不由地笔下有了一种辣味！我想，这也不奇怪，人也和姜一样，老了就是辣的！

1988 年 4 月 8 日晨急就

介绍《小帆的灯》

北京日报《小苗》的编辑同志寄来了一篇小朋友写的《小帆的灯》，想不到我的《小桔灯》又招来了一盏又一盏的小桔灯！

冬季桔子很多，做一盏小桔灯并不费事，可贵的是要学我的《小桔灯》里的那位小桔灯的制造者的那种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这精神会鼓舞小朋友们对于祖国的腾飞、人民的幸福，尽上自己最大的努力！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88年6月1日。）

《女大学生抒情散文百篇》序

也许是由于偏爱，我总觉得女作家的抒情散文，总是更婉约，更细腻，更深沉，也更尖刻。

信不信由你！我只请读者们从这本由我国各大学里的各民族的女大学生写的抒情散文里，去考研和印证。

1988 年 4 月 26 日清晨

致黄安榕^①

安榕同志：

前天收到您寄来的钦鸿同志写的《一位被遗忘的作家——记冰心的三弟冰季》，拜读之余，感极而涕！钦鸿同志手里一定有冰季的小说集，我这里已经没有了，他如果肯将冰季的小说集送给我，即使借我一读，也将感激不尽！

冰季的那些文章都是他在对他夫人刘纪华热恋时期中写的，这段事情，我在《关于女人》第七段中《使我心疼头痛的弟妇》中写过。至于冰季后来的工作和遭遇，我在《中国作家》1987年第六期中《关于男人》之七《我的三个弟弟》的末一段，就是写他的。反右之事，就是他生命中坎坷的一段，回忆起就使我心疼，反正1957年以后，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劫难逃”，还有什么话好说？……

匆复，并祝

① 黄安榕，福州市文联副主席，《榕树》杂志常务副主编。

撰安

冰 心

1988 年 4 月 26 日

远来的和尚……

我叫钱清，他叫钱宓，我们是三十多年前在美国认识的。

如今他就坐在我的对面，一身笔挺的藏青色西装，皮鞋擦得锃亮，却戴着一条黄色绣着金龙的缎子领带，似乎显得俗气，这就是钱宓。他也许看着我这一身褪了色的蓝布中山装觉得寒伧呢。

我是四十年代末期在国内一所名牌大学得了生物学的学士学位，又得了美国东部一所名牌大学的奖学金去进修的。因为成绩还不错，得到了系主任威尔逊博士的欣赏，我跟他写了硕士和博士论文。得到博士学位后，他又留我在系里当了他的助手。

也就在这时，我认识了我的妻子艾帼。她是台湾人，可是对于大陆祖国的一切，十分向往。她学的也是生物，和我接触很多，又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总是追着我问关于北京的名胜古迹，说是“要能回去看一看多好！”她还说：她的名字本来叫“帼英”，因为

热爱祖国，自己把“英”字去掉了，因为“艾帼”，叫上去就是“爱国”。那时台湾和大陆还绝对不能来往，我本来就心里喜欢她，就和她开玩笑说：“除非你和我结婚，我就能把你带回去。”她红着脸打了我胳膊一下，她一向很拘谨，这种表示是她从来没有过的。我就大着胆子，拉着她的手说：“你如和我结婚，回到大陆，就不能回台湾去了。”她还是红着脸，低下头去说：“我台湾家里，上有兄姐，下有弟妹，我的父母是不会太想我的。”就这样，我们在美国结了婚，一年后我们有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一个叫“纪中”，一个叫“念华”，也是艾帼给她们起的名字。

也就是这时，钱宓从国内来了，他是自费留学的，也想学生物，知道系里有中国老师，便来找我，拉起同胞的关系来，亲热得了不得！但是他的英文程度很差，我就推荐一个急于找工作的女生，帮他补习。这个女生叫琳达（她的母亲是个黑人，她长得却完全是白种人的样子，白皮肤，蓝眼睛，一头浅黄的卷发，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父亲，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她便姓了母亲的姓），钱宓和她不久就恋爱上了，钱宓家里大概很有钱，因为我们看见琳达戴上了一只很大的钻石戒指。（他们结婚后，钱宓还花了一大笔钱，把琳达的母亲送到芝加哥她的兄弟处去，因为他怕朋友看见他有个黑人的“丈母娘”。）

钱宓结婚后，两年中间也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叫琳达，一个叫露西，她们常到我们家来玩。我们在家里都说中国话，琳达和露西都听不懂，因为她们的父亲，从来不教她们说中国话，哪怕是简单的一两个字！但是纪中和念华上的都是美国小学，她们可以用英语交谈。

在美国的十几年，匆匆过去了，在威尔逊博士的苦留和祖国母校的敦促下，我还是选择了回国的道路。这时钱宓又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在我任教的这所大学里替他找个位置，他笑着说：“我听他们都亲昵地叫你‘钱’、‘钱’的，也许他们会让我这个姓‘钱’的顶了你的缺。”

我腻烦地看了他一眼，说：“你自己去同威尔逊主任说说看。”我们一家就忙着收拾回国了。

这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这二十年来，他回国来了好几次，在蒋介石未死之前，他是回大陆一次，也必到台湾一次，也都说是探亲访友，也想法到各大学去演讲。蒋介石死后，他就不去台湾了，专跑大陆。据我在美国的中国朋友信中说，他自称是国内大学请他回去讲学的。他每次回来总要通过外事部门以美籍华人教授的身分请见政府领导，于是报纸和电视上，也有政府领导接见他的短短报道和镜头……

他对我倒是很殷勤的，这时正问着我们的近况，我说：“我还是教我的书，艾帼在生物试验室里当了个副教授。纪中是个北师大的毕业生，现在正教着中学。念华是医科大学毕业了，正在大学的附属医院里实习。”同时我也问他，他笑说：“琳达是个地道的美国式的贤妻良母，我的两个女儿都和美国人结了婚，对方都是商业界人士，至于他们做什么买卖，我也没有细问，反正她们都过得不错，因为她们都不必出去工作。”

艾帼把整治好的茶点端了出来，放在茶几上，我们正要开始吃茶，外面的汽车喇叭响了，钱宓赶紧扔下茶巾，站了起来说：“对不起，我要去受领导的接见了……你见过这几位领导没有？”

我也笑着站起来，说：“我一个普通的教授会有被召见的荣幸？只不过在开政协会议的时候，在台下静听他们的报告……”钱宓也不知听见没有，脚步早已跨出了门外。

我们把他送上了车，艾帼关上了院门，回头撇着嘴对我笑，“这真是远来的和尚好念经！”

1988年4月28日晨

介绍我最喜爱的两篇散文

《文汇月刊》约我写一篇我最喜爱的散文，已是半年以前的事了。这半年中我也看过了不少的散文，但没有什么使我特别动感情的。前几天中学生杂志社给我送来了一尊小天使铜像和一本《献给孩子们》的小天使铜像奖征文专集（因为我曾为这次的征文奖写了题词）。我原来以为应征者一定都是中学生。翻开书本一看，文章的作者竟是些知名的作者！我十分欢喜地阅读了下去。把这本书中的散文、小说、诗歌、童话四辑的作品一口气在一天里看完了，真是琳琅满目。因为《文汇月刊》要的是“我喜爱的散文”，我就只把我最喜爱的两篇介绍一下。

第一篇是苏叔阳的《留在我心底的眼睛》。

读者们都会和我同感，一个人喜欢一篇作品总是带着很大的主观因素。因为自己的经验中，也有过这么一段，读起来就格外亲切。

我也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被卷进了“横扫一

切”的风暴里的。我是“黑帮”，我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我想：我从来没有得过“学术权威”的头衔，我又何从“反动”起？我也被批斗过，但多半是“陪斗”，我还不配做主要批斗对象，我的上面还有“四条汉子”之类的大人物挡着呢。但是我还是住进了作协的“牛棚”。我和叔阳同志一样，“心里充满了迷惘和痛苦”，人人远离我，仿佛我是个传染病患者。

忽然有一天，我正在作协楼下“劳动”，我从前写过的“咱们的五个孩子”中之一周同庆，跑来看我。那时她不过十岁左右吧。我惊奇而又感动。我悄声地对她说：“你赶快走吧，这不是个好地方，我会连累你的。”她摇头说：“我不怕，谢奶奶，您是好人！”在看守着我们的人的面前，我不禁流下了热泪，这正是我关进“牛棚”后第一次下泪！

叔阳同志却有一次更为意外的境遇：“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站在铁栏外面对着我，‘叔叔，给！’她把一根冰棍儿从铁栏外伸过来，两只眼里全是真诚和期待。”在受尽种种折磨，始终没有掉泪的他，竟也被这个“小姑娘的心”捅开了泪泉，也忍不住去接了那根冰棍。

他写：“当我再回过头来的时候，那小姑娘已经走了。”“啊，你这清秀的小姑娘，你的姓名我不曾知道，但是你的爱心，你的正直，你的透澈的眼睛给了

我希望，给了我力量，使我度过了那疯狂、颠倒的岁月，我永远感谢你。”

多么可爱可敬的一个小姑娘呵！

刘厚明同志的《陶马》却把我带进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童年欢乐的世界。这篇作品里也有一个不知姓名的可爱可敬的小姑娘！

他写他到了“就要收场”的“地坛文化迎春会”，“这里多年不见的北京‘老玩艺’可真多：风车，空竹……都是我儿时爱玩爱吃的东西，都能勾起我重温那些逝去已久的童稚的梦。”看到这里，我不禁微笑了，这不是我七十多年前逛隆福寺庙会的回忆吗？

他逛的这个“地坛文化迎春会”，毕竟不同于七十多年前我逛过的隆福寺庙会，因为在“一处工艺售货棚”的“玻璃柜台上放着一尊唐三彩陶马”。

他说：“这是一件真正完美的艺术品……它大有‘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气概。”他决定把它买下来！

但“柜台前已经站着两位顾客”，“一个是脖子上挂着照相机的摄影记者”，“一个是挎着个帆布大画夹的小姑娘，十三四岁模样。”他们虽然有“先来后到”，但都想买这只陶马。作者是“个人没有别的癖好，就喜欢收集工艺美术品，家里的小摆设琳琅满目，就缺一件中意的唐三彩了！”

“它太美了，我要拿它画一张静物，或者就这样看着它，不也是一种美的享受，我宁可不买那两本精装的印象派画集，也要把这陶马买下来！”当作者和摄影记者都说十八块钱太贵的时候，那夹着大画夹的小姑娘却迷醉地说。

摄影记者终归是先来的，他“开始掏钱，他翻遍衣兜裤兜，连毛票带钢镚儿，在柜台上堆了一堆。数数，统共只有十四元六角七分，他要为在工艺美校上学的儿子买生日礼物的希望落空了！”那位记者“抓起钱转身要走”。

小姑娘突然叫了声“叔叔！”又“拉开她那小钱包的拉链掏出一卷钞票，抽出四张一元的放在柜台上，说“这就够了！”记者一下惊呆了，说“谢谢，这不是借给我钱，是把美送给了别人呀！”

在老售货员数钱的时候，记者和作者回头看看，找不见小姑娘的影子了。记者着急着说：“这孩子，也没留下地址，怎么就悄默声儿走了？我可怎么还她的钱？”说着就“拿起陶马，捂住胸前摆摆晃晃的相机，拔腿向出口追去。”

作者“望着那个方向，忽觉整个的心被一种失落感攫住。我失落了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一尊陶马？”

厚明同志，我估摸着您失去的除了一尊陶马之外，还失去了那个小姑娘的姓名和地址，也失去了和

她做个“忘年交”的机会，是不是呢？

我猜想这个小姑娘是对那个记者在工艺美校上学的、后天就过生日的儿子，有着最亲切的理解和同情，她才愿意舍弃了买下这陶马的机会，来成全这个记者的“父爱”。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月刊》1988年第9期。）

落 价

我们家的老阿姨回安徽老家去给儿子娶媳妇的时候，对我说：“宋老师，我这次回去，可能不来了。我总觉着在您家里干活，挺轻松、挺安逸的。我的侄女昨天从乡下来了。她刚念完初中，她妈妈就死了，她爹又娶了后妻，待她很不好，尽叫她下地干农活。我听说了怪心疼的，就托同乡把她带来了，想让她顶我的缺。她什么都会，又有文化，比我强多了。”说着从身后拉过一个二十岁左右、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姑娘来，说她叫方玉凤，又催她说：“你快见见宋老师，她就是你的东家！”小方腼腆地向我鞠了一个深深的躬。

那时我还没有退休，我女儿小真大学刚毕业，也在中学里教书。家中里里外外的事也不少，有小方来帮忙，我很高兴。

小方虽然瘦弱，却很利落麻利，来了不到一个月，我们就都十分喜欢她。她也因为久已没有家庭的

温暖，在我们这个简单的小家庭里，似乎又得到了和睦融洽的“家”的滋味。小真总把自己穿过的衣服，一年四季给小方换上。她俩就像姐妹一样地亲热。每天晚上小真还教她英语、数学等，鼓励她去考中专。

两年过去了，忽然有一天，小方很难为情地来对我说：有个同乡介绍她到一家面铺当售货员，每月工资有一百九十元，奖金在外。她几乎流着眼泪说：“我真是舍不得离开你们，可是我若想上学，不攒一点学费不行……”这时我已经退休了，足可以料理家务了，因此我和小真都连忙说：“这个我们了解而且也替你高兴，你去吧，有空常来走走。”

小方真地像回家一样，每个星期天都来。本来在我们家两年，她已经丰满光鲜得多了，这时再穿上颜色鲜艳的连衣裙，更是十分漂亮，我们都笑说几乎认不得她了。

她每次来，都带着果品，尤其常送些新鲜的南豆腐，她说：“从书上看到老人骨节疏松，最好吃些带‘钙’的东西，除了牛奶、鸡蛋之外，最好的是豆制品了。你们上街买菜时，不容易碰得到好豆腐。”当我们辞谢她时，她还对小真挤眼，笑说：“我的工资比你们都高，这点东西算不了什么。”我们也只好由她。

有一天，她拿来了一架小长方形的白色蓝面的

收音机，放在我的书桌上，说：“这收音机才十八块钱，不到我工资的十分之一，你们早晨起来听‘新闻和报纸摘要’不比订那些报纸强么？从前我每次到邮局去替您订这个报、那个报的，我都觉得很浪费！其实那些报纸上头登的都是一样的话！”我一边赏玩着那架小巧的收音机，一边笑说：“报纸上也不尽是新闻，还有许多别的栏目呢。而且几份报纸看过了，整理起来，也是一大摞，可以卖给收买破烂的，不也可以收回一点钱？”

小方打断了我，说：“您不知道，‘破烂’才不值钱呢！现在人人都在说，一切东西都在天天涨价，只有两样东西落价，一样是‘破烂’，一样是知识……”小方忽然不往下说了。

我的心猛然往下一沉，心说：和破烂一样，我们是落价了，这我早就知道！

1988 年 5 月 11 日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收获》1988 年第 5 期。）

致 宫 玺

宫玺同志：

得来信，使我十分不安！您夫人是什么病？在哪个医院看的？我都不清楚，您千万要镇定，要乐观，这和病人心理，也有关系，您心神不宁，对她也有影响。

文集事千万不必着急！可否让社里别人来看，也可减轻您的负担，巴金纪录片还未看过，我们倒是常通信。

吴青当了市人大代表（她哥哥也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她在海淀区，他在丰台区）。她就是太爱说话。匆复并祝
合第安吉！！

冰 心

五、廿三、一九八八

致王安忆

亲爱的安忆：

你那本长篇收到了，我觉得不如你从前写的那般好看，你要锻炼你的素质如意志毅力，自控力等等，从那篇小说里，我不大看得出来。

你去一趟日本，感想如何？我案头现在正供着有日本朋友因听到我病了，由国际花店，送来一银盆的鲜花，真美！将来寄张相片给你看，我希望你再写些短篇，祝你母女安吉。

冰心

五、三十、一九八八

我 感 谢

——《人民日报》创刊40周年感言

在《人民日报》创刊四十周年之际，我忍不住从心底向她呼唤出最诚挚的感谢。我感谢《人民日报》文艺部的诸位编辑同志，这四十年来，让我在副刊的版面上，印上许多我当时的欢乐和忧思！

编辑同志回忆说，我在副刊发表过《再到青龙桥》和《再寄小读者》的头几篇，那都是一九五八年的事了。我记得在一九五六年六月我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一个母亲的建议》。

以后的就是一九五七年的《观舞记》，一九五八年的《我们这里没有冬天》，一九五九年《我们把春天吵醒了》，一九六一年的《樱花赞》等等。

但是我最感谢的还是那一篇一九八七年十月十日写好，直到十一月十四日才发表的《我请求》。我几乎每天都能得到一两封小读者的来信，都是他们从课本上读到《寄小读者》或《小桔灯》的反响。没

想到我得到大读者对我的作品反响最多的，却是这篇《我请求》！大约有好几十封吧，而且写信人多数不是教师。他们也都同情我的看法。

今年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的一篇署名评论《多一些阳光，多一些透明》，给我平添了许多吐出喉头骨鲠的勇气。千真万确的是：多一分透明度，就多一分凝聚力！也就是文章中所说的“密切领导与群众关系，争取群众为国分忧”。

为了增加透明度，我还想做一次文抄公，其实这些文章和消息在书刊上都已经登过了。

在《教育与职业》杂志今年五月号里有两篇转载，一篇是《重视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另一篇是《制定教师法，提高教师地位和待遇》。

前一篇的文章一开头便说：“十三大报告明白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必须坚持把发展教育放在突出的战略地位’。……如果今天我们还不痛下决心与狠心，把教育事业落实在行动上而不停留在口号上……那么，报复将在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在二十一世纪。”

后一篇文章内提到：“现在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去年教师节时，全国政协政教组邀请农村教师代表座谈时就发出呼吁，把挥霍浪费的钱财节约下来用在教育上……我们近来在报上看到：2500万元建成

一个‘死厂’，200多台机器设备面临变成废铁的危险……近二三年花外汇3亿美元，进口食品机械3000台套，其中冰激凌机700多台，雪糕机300多台……有人说我们只看到‘冰激凌危机’，‘雪糕危机’，没有看到‘教育危机’。”作者呼吁用十三大精神统一我们的思想，把发展教育放在突出的战略地位。

好了！我终于看到了五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上面登出的使全国人民兴奋的消息！就是说，五月二十七日上午李鹏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六次常务会议，决定停建一批不必要的楼堂馆所，省下的钱将用于教育和改善人民生活。

我感谢这英明的决策，也感谢使我知道消息的《人民日报》。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88年6月30日。）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昨天上午从我的展览会回来，就得到你七月六日的信，昨早我在会里看见了你让他们送我的花盆，又听说你有祝贺的电话来，真是太感谢你了。昨天的会上相当热闹，朋友不少，鲜花也多，有几位朋友讲了话，但都在我去以前，他们只让我坐轮椅上在会场转了一周，半个小时就回来了，回来后读到你的信，你的真话，使我感动，就那么写吧，几十个字就可以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你写字困难，事情又烦，不要回信了，让香香写就行。告诉香香我谢谢她的贺电，他们已把它陈列上去了，吴青请你鼓励，我以为不如控制她，这孩子太任性，总有一天……

请你保重！！问端端、暄暄和一家好！

冰 心

七、十三、一九八八

致 宁 民 庆

民庆同志：

您的信早就收到了，信债文债太多，迟复为歉。

我没有文章题目，也未读过《人才报》。我倒有一个问题，想请读者想想再回答。

我从小读书，老师说：“士”为四民之首，所谓之“士”，当然指“读书人”了。现在都讲“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士”呢？没有答案，我也说不出来，请您在《人才报》上问问读者们吧！

匆匆，祝

撰安！

冰 心

七、廿二、一九八八

《赵朴初诗词集》序

我和朴初同志是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参加以刘宁一同志为团长的“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到日本的旅途中认识的，当我看到团员名单上有赵朴初居士时，我总觉得对于这位超然物外的居士，我们俗人应当敬而远之。想不到见面交谈之后，他竟是一位不但可敬而且是可亲的朋友！他洒脱温蔼，不但深通佛学，而且精书法，善诗词，在这些方面都是我没法做到，而却是朴初的擅长。我们又都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员，彼此熟悉了以后，他每写出一首诗或词，必正笔赠我。他的一首《金缕曲》，追悼周恩来总理的，每次披读，总使我下泪。这位居士并不能超然物外，他是个大忙人，要参加海内外种种宗教活动，仆仆于海内外寺院庵堂之间，求书索诗的人，又踏破了门槛。他常对我抱怨找不到一个接班人，我放眸海内，也寻觅不到能像他于万一的人，至少是现在！

朴初要重新发表他的诗词集，要我作序，我感到

了意外的荣幸！

冰 心

一九八八年七月廿八日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你的那篇序言和信都收到了。那么热的天，你的手又抖，居然写了那么长的文章，真是使我感激！打电话把卓如在大雨中叫来，她看了简直是喜极欲狂。我说，“你自己写信谢谢巴老吧！”吴泰昌又来多次电话，要这篇序在文艺报上发表，卓如说要复印一份寄给他。

吴青去青岛讲学，陈恕父子也跟着去了。因为陈恕的母亲在青岛住他姐姐家，已于七月底走了，要八月十三日才回来。

吴冰得了美国哈佛大学奖金要赴美进修一年半，八月廿日就走了。她读了你的序，说“巴金舅舅写得真好，这么热的天，难为他了。”北京也是盛暑，讨厌的是雷雨说来就来，潮湿得和南方一样，我最不惯，关节炎又犯了，老了，总有些毛病。

我心里常常装着你们一家人，小林夫妇和端端、

棠棠夫妇和暄暄，以及现在还在你身边的香香，她何时回来？我的生活，囿于一室之内，孩子们正为我忙“空调”，不知何时能安上。他们叫我不要管，“静言思之，不能奋飞”！望你保重，一家人平安快乐！

冰 心

八、三、一九八八

展览会你送我的花，让我的儿子吴平拿回家去了，我又把缎条拿回来。

干 涉

晓岚手里捏着一摞“杨谦教授启，上海柳斌”的航空信封，呆呆地坐在父亲的书桌旁边。

爸爸临时到沈阳开学术会议，去了两个星期，这是两个星期内从上海来的信，一共是四封，摸上去都不薄，而且字迹十分娟秀，好像春风里摇曳的柳枝一般。

爸爸是经济学教授，是个学术权威，他已经七十岁，过了退休年龄，可是学院里还请求他带几个研究生。

爸爸和妈妈是大学里同班同学，恋爱结婚的，婚后又一同留校教学，生活十分美满。他们有两个女儿，晓岚和晓芬，她们也都结婚了。晓岚是和她的一同上山下乡的知青王卫东恋爱结婚的，有了一个八岁的儿子叫冬冬。晓芬和她的爱人李卓，是在大学里

同班，恋爱结婚的。她们两姐妹婚后，都分住在各自的机关里。

爸爸和妈妈的宿舍是大学高知楼里一个四室一厅的单元，他们夫妻的卧室是比较大的，放着有“席梦思”褥子的双人床，大穿衣柜，五斗柜等等，对面朝北的一间，是老阿姨住的。客厅的右边是他们的书房，比卧房小一些，两张书桌对面放着，如同一张大方桌，沿墙是好几个书柜，客人来了都称赞房子布置得真好。

不幸的是妈妈于十年前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了，爸爸十分悲痛，还把妈妈的骨灰盒放在自己书桌旁边的书架上，来陪伴自己。他不会照料自己，晓岚一家便很高兴地搬来和他同住。爸爸把那间大卧室让给他们，自己住到书房里去。冬冬也由那个老阿姨带着住，在北屋里。爸爸每月的工资，一大半都交给晓岚作为家用。晓岚觉得日子过得又轻松又自在，她努力把爸爸侍候好，又悄悄地把妈妈的骨灰盒藏在墙柜里。

想不到在妈妈死去十年之后，爸爸到上海开过一个学术会议回来，爸爸的精神活泼了起来，面色也红润了，说话也显得兴奋，而且还常常得到“上海柳絮”这种很厚很厚的信！爸爸是不是又和人搞恋爱了？晓岚从心底涌上一股酸涩的滋味。是替妈妈吃醋

呢，还是看不起爸爸，仿佛他这样做有失身分？

她手里拿着那几封信，正在发愣，妹妹晓芬来了，她是来看爸爸的，听说爸爸临时到沈阳去了，又看见晓岚手里的几封信，晓岚便把自己心里的疑虑，告诉了妹妹。不料晓芬却很高兴地笑了起来，说：“妈妈走了以后，爸爸似乎老了许多，如今又有了对象，足见老来也需要贴身的、可以讲些老话的伴侣。此外，还有许多事，比如病痛，我们到底不能照顾得周到。我看这事如果有了眉目，你千万不要干涉！”

晓岚难过地说：“我不是想干涉，不过爸爸临老又恋爱结婚，他的学生们听见了，也会笑话……”

晓芬笑说：“你和王卫东恋爱的时候，妈妈还不同意，嫌他不是书香门第出身，不是爸爸坚持说：‘不要干涉儿女的恋爱和婚姻的自由’吗？我看你还是……”

两个姐妹的谈话，就僵着说不下去了。

过两天爸爸从沈阳回来了，晓岚把“上海柳緘”的几封信给了他。他高兴地接了过去，看过了笑对晓岚说：“这位柳教授要参加一个旅游团来到北京。在上海开会时她接待过我，我想我也应该好好地接待她。”

晚上过道墙上的电话响了，晓岚不等爸爸出来便抢着去接，摘下了话筒，据说是从科学院招待所打

来的，话筒里是一位女人很清脆的声音，问“杨谦教授在家吗？”晓岚说，“在，您贵姓呀？”话筒里说“我姓柳，从上海来的。”这时爸爸已经站在身后，把话筒接过去，晓岚一扭身便回到自己屋里，把屋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爸爸来叩她的屋门，笑着说：“刚才那个电话就是那位柳青教授来的，我想陪她在北京玩两天，再请她来家吃饭，到时你就准备一下，也叫晓芬夫妇来参加吧。”晓岚低着头，“嗯”了一声。

从第二天起，爸爸就天天出去，每天临走时都说：“我不回家吃饭了，你们不要等我。”

到了爸爸让她准备请客的那一天，晓岚一面腻烦地帮着老阿姨做菜，一边忧郁地想，“假如爸爸真的和柳教授结婚了，我们就必须把这房子让出来，回到那两间窄小的单元里，去过从前那种清寒的日子，连保姆也请不起了……我必须干涉爸爸的这段婚姻！”

在这天的宴会之前，她从墙柜里搬出妈妈的骨灰盒来，拂拭了一下，又摆在爸爸书桌旁边的书架上，还在客厅和爸爸的书房和卧室墙上挂上几张爸爸和妈妈不同时期的合影。

晓芬夫妇在宴会前半小时才兴冲冲地来了，还带来一大把鲜花。在插花的时候，他们看了客厅和爸

爸屋里的新的布置，都惊诧地对看了一眼，又看了晓岚一眼，默默地低下了头。

这时爸爸已经陪着一位衣着很素净，仪态很大方，年纪在六十岁左右的妇女进来，一面笑着向她介绍说：“这是我两个女儿的家里人，”又对她们说：“这位就是柳青教授。”大家向前一一地握了手，喝过茶后，晓岚立刻就带客人去参观他们的居室。爸爸看见自己的书架上又摆上了妻子的骨灰盒，面容不由得严肃了起来，饭桌上王卫东和晓芬夫妇都热情地同客人谈笑，也问长问短，知道柳教授的老伴过去十二年了，也有已婚的两个儿女，也都住在各自的宿舍里，只每星期天到柳教授住宅里来聚餐。晓岚却是除了向客人碗里夹菜之外，一语不发。冬冬却向他妈妈耳边悄悄地夸“这位老太太真好！”

饭后喝过咖啡，柳教授就起身道谢告辞，爸爸说：“我送你到出租汽车站吧。”晓岚就表示也要去送，晓芬急忙在姐姐的胳膊上捏了一把，晓岚只好说：“冬冬陪外公走一趟吧。”冬冬就追了出去。

不久，冬冬就回来了，说：“外公说外面太冷，叫我快回去，怕凉着。”晓岚赶紧问：“他们还说些什么？”冬冬搔了搔头说“仿佛是那位柳奶奶说，‘看来你大女儿不喜欢我们在一起——’外公叹口气说，‘恐怕我们只能像铁路上的两条钢轨，尽管一路并肩

同行，可是永远也不会聚在一起……’”

1988年8月5日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88年第9期。）

致 宫 玺

宫玺同志：

因为肠胃关系，又到医院住了三个星期，今天才有机会来还信债！您的八月一日的信收到许久，我还是关心您爱人的病，我们只尽我们的心力，死生有命，人生总要经过这一关。我是过来人，您会得到我的同情！我的书何时出版都没有关系，不必急急为此费神。初愈腕弱，书不尽意！

冰 心

九、八、一九八八

题 赠 刘 金 涛

您以精湛的艺术，替我裱了许多字画，也有名人的，也有我自己胡写的，从不索要报酬，我真不知该怎么办！这是一张日本朋友送的好宣纸，扶病书此请金涛同志留念！

冰 心

戊辰仲秋

我呜咽着重新看完《国殇》

在我因病入院之前，编辑同志便要我写一篇评论霍达同志的报告文学《国殇》这篇文章，我一听到“国殇”这两个字，就心惊肉跳！我准知道这一定是一位满含着热爱祖国和一腔冤愤之心的作者，用自己的笔浸着血泪写的。入院以前的我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经不起这种刺激，便搁了下来。三个星期以后，从医院回来，才把这篇惊心动魄的文章看了一遍。我伤心而又担心。担心的是看到这篇文章以后能有权力处理的人，不会有时间来看它，看到它之后又“忙”得未必伤心！

但我想中国十亿人民之中，应该还有一些“关心祖国前途民族命运的人们”。这些人虽然只是一些老百姓，一些“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但他们至少比我年轻一些，劲头大一些，也乐观一些。

《国殇》的作者，听说是一位女作家，虽没有同她见过面，但我佩服她的勇气，她把半边天撑下来

了！我向她致敬！希望她一直坚持这样地写下去，至少我希望她不像我这个“多少事欲说还休”的老人！

《国殇》里那些为“国”而“殇”的知识分子，我一位也不认得，但他们的形象在我的脑子里是活灵活现的！因为这样的人物和他们的遭遇，不但科技界中有，社会科学界中也有，文艺界中也有，正如这篇文章里说的：“我国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知识分子共约600万，他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埋头苦干了几十年，‘文革’过后（“文革”前头，还应该加上“反右”二字！——冰心注），在科技、文化、教育事业一片荒芜，百废俱兴的时期，他们成为最可依靠的中坚力量，或曰‘中流砥柱’，他们一直在超负荷、高消耗下疲于奔命，体质一直下降或未老先衰，或猝然死亡，这不是偶然的現象了。”

文章的末尾说：“我国知识分子的总收入尚不及普通劳动者（比起腰缠巨万的“倒爷”来，更有天渊之别了。——冰心注），大约是世界上知识分子待遇最低的国家之一了，而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分子都格外得到尊重，有着一般体力劳动者所不及的优厚待遇，我国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寿命比全国人均寿命要短近十年。为了中华民族的腾飞，抢救中年知识分子迫在眉睫。”

说“腾飞”是很乐观的话，长出翅膀的知识分子，

有的已经折掉了，坠地了，有的已经飞走了，“外流”了，抢救谈何容易！

说一千，道一万，抢救知识分子的工作，还得知识分子自己来做，“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呼吁，请求，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我有这个经验！

1988 年 9 月 1 日急就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88 年 10 月 15 日。）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近来真想你！我身体也不太好，本来行动就不便，整天在屋里转来转去，腻烦极了！看书又没有什么好的，我想若能把我们两人弄到一处聊聊多好！我病了三个星期，刚从医院回来，已好，勿挂！

听说小林病了，全家流感，怎么回事？不要紧吧？愿她千万保重。听说你住院，没有别的，只是“胆”大，你的胆本来就大！否则如何写出《随感录》！

问香香好，收到了她的信，希望她快回来，棠棠的电影剧本一定要寄我！

北京已到金秋，十分爽人，就是物价也在飞涨。

祝

大家好！

冰 心

九、廿七、一九八八

致 宫 玺

宫玺同志：

九月一日示悉。我的文集怎么出都行，收错了文章，也不要紧，不要多去顾虑。巴金为卓如写的我传作序，我很感谢。《巴金传》也在你社出版，很好。我惦记的是您爱人的病！近况如何？要宽心一点，乐天知命，我经历多了，只能这样安慰您！

常从杂志上看到您的小诗，真不错。病了三星期，刚从医院回来，恕不多书。祝合家安吉！

冰 心

九、廿七、一九八八

《冰心读本》序

这个读本里所选的散文，多是我在二十至三十年代之间，在国内外写的。那时我年纪轻，感情天真也比较敏捷，写起来情到笔到，没有太多的考虑。我想这种文字对中学生文库的读者仍可能有较好的共鸣。但是八十年代的青年到底比二三十年代的会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沉的反思，一定会写出比这些散文更好的文章！

冰 心

1988年国庆日

（《冰心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

致 陈 玒^①

亲爱的大姐：

前天就接到你的信了，但吴青拿去，说她代回，结果是反而耽误了。学玢同志的病怎样了？服了爷爷当初吃的通大便的药，有没有效验？超声波的结果如何？万分挂念。我的身体仍不太好，您去了也只好一切凑付。张阿姨人很好，但是力气不够，吴青陈恕尽力帮忙，但也不能常在家。我看我是活得太长了，成了个多余的人！我只希望姐夫早一点复原，您可以早点回来再陪我一两年就行了。许多朋友来，如周明、吴泰昌等都问您好，也希望您早回来。你带衣服花了那么多钱，真是冤枉。吴冰从美国来信也问你好，余不赘。祝你合家安吉。

冰 心

十、二、一九八八

① 陈玒，冰心的小女婿陈恕的大姐。

喜谈《炎黄子孙》

《炎黄子孙》是在亚洲这一块上下五千年，纵横近千万里的中国土地上的炎黄子孙的业绩和工作的报道和纪录。我从这本刊物里得到了许许多多我已经知道或从未知道的关于古今中外的我亲爱的同胞们的追求和信息；这对于八年来因病而闭居不出的我，是个很大的快乐和安慰。我从心里感谢《炎黄子孙》，祝愿它越办越好，也祝愿八十年代的炎黄子孙在追求和事业上，有更宽阔的视野和更深沉的反思！

一九八八年十月八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88年10月19日。）

为首届“我看中国”国际青少年 征文作品选题词

希望参加“我看中国”的国际青少年们能以真挚的心情、宽阔的视野和深沉的反思，来看这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八十年代的中国！

冰 心

一九八八、十、十一

（本题词最初发表于《首届“我看中国”国际青少年征文作品选》，1990年7月，长春教育局印刷厂印制。）

致 陈 琦

亲爱的大姐：

至今未得你信，十分挂念！不知大姐夫做完超声波以后的情形怎样？

这里一切照常，不过你不在这里，情形就又不同了，以后再说吧。有一封南京《扬子晚报》的信是给你的，特转上。问你们一家人好！

冰 心

十、十三、一九八八

关于男人（之七）

九 追忆吴雷川校长

一九八五年文藻逝世后，我整理他的书籍，忽然从一摞书中翻出一个大信封，里面是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老先生的一幅手迹。那是一九三七年北平沦陷后，我们离开燕大到云南大学去的时候燕大社会学系的同学们请吴雷川校长写的、送给我们的一张条幅，录的是清词人潘博的一首“金缕曲”，吴老在后面又加了一段话。找到这张条幅，许多辛酸的往事又涌上心头！我立刻请舒乙同志转请刘金涛同志裱了出来，挂在我的客厅墙上。现在将这幅纸上的潘博的词和吴老的附加文字，照录如下：

悲愤应难已，问此时绝裾温峤投身何地？莫道英雄无用武，尚有中原万里！胡郁郁今犹居此？驹隙光阴容易过，恐河清不为愁人俟。闻吾

语，当奋起。青衫搔首人间世，叹年来兴亡吊遍，残山剩水！如此乾坤须整顿，应有异人间起，君与我安知非是？漫说大言成事少，彼当年刘季犹斯耳，旁观论，一笑置。

文藻先生将有云南之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诸同学眷恋师门，殷殷惜别，谋有所赠，以申敬意，乃出此幅，属余书之。余书何足以充赠品？他日此幅纵为文藻先生所重视，务须声明所重者诸同学之敬意，而于余书渺不相涉，否则必蒙嗜痴之诮，殊为不值也。附此预言，藉博一粲。

二十七年六月杭县吴雷川并识

一九二六年我从美国学成归来，在母校燕京大学任教时，初次拜识了吴雷川校长。他本任当时的教育部次长；因为南京教育部有令国内各级教会学校应以国人为校长，经燕大校董会决议：聘请吴老为燕大校长。吴老温蔼慈祥，衣履朴素，走起路来也是那样地端凝而从容。他住在朗润园池南的一所小院里，真是“小桥流水人家”。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个夏天的中午，我正在朗润池北一家女教授住宅的凉棚下和主人闲谈，看见吴老从园外归来，经由小池的北岸，这时忽然下起骤雨，吴老没有拿伞，而他还是和

晴天一样从容庄重地向着家门走去，这正是吴老的风度！

“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都南迁了，燕大因为是美国教会办的，暂时还不受干扰，但我们觉得在日本占领区一刻也呆不下去了，文藻同云南大学联系，为他们创办社会学系。我们定于一九三八年夏南迁，吴老的这一张条幅，正是应燕大社会学系同学的请求而写的，这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

此后，太平洋战起，燕大也被封闭，我们听说汉奸王克敏等久慕吴老的为人，强请吴老出任伪职。吴老杜门谢客，概不应酬，蛰居北海松坡图书馆，以书遣怀，终至愤而绝粒，仙逝于故都。

吴老的书法是馆阁体，方正端凝、字如其人，至今我仰瞻挂在客厅墙上，从这幅字迹，总觉得老人的慈颜就在眼前，往事并不如烟！

1988年10月21日清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作家》1989年第1期。）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十月十一日信收到，我也想向你发发牢骚，但牢骚发了又有什么用处？倒是大家聚一聚，什么都谈，不只是牢骚，谈些可笑，可悲，可叹的事，都可以打发日子。

小林信我已回了，你“胆”大，可以敢说真话，精神是应有物质为基础的！

昨天看见《文艺报》上有你的话，说你不会搁笔，我想也是。你总是说搁笔，我相信你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北京已经冷了，炉子未来之前，只赖阳光了！问你们一家好！

小林要好好休息，她太累了！听说她要到香港，换换空气也好。

香香何时回来？

大 姐

十、廿四、一九八八

养 猫

林斤澜同志来信叫我谈养猫，但我并没有养猫。

咪咪是我的小女儿吴青养的。不过在选猫时我参加了意见。

当三只小猫都抱过来放在我的书桌上时，我一眼就看上它！它一身雪白，只有一条黑尾巴和背上的两块黑点。

我说：这猫的毛色有名堂，叫做“鞭打绣球”。我女儿高兴地笑了说：那就要它吧。一面把它的姐妹送走了。

后来夏衍同志给我看一本关于猫的书，上面说白猫有一条黑尾巴，身上有黑点的，叫做“挂印拖枪”。这说法似乎更堂皇一些。

我自己行动不便，咪咪的喂养和调理，都由我的小女儿吴青和她的爱人陈恕来做。他们亲昵地称它为“我们的小儿子”。特别是吴青，一下班回来，进门就问：我的小子呢？

他们天天给它买鱼拌饭吃，有时还加上胡萝卜丝之类的蔬菜。天天早上还带它下楼去吃一点青草。还常常给它洗澡。咪咪的毛很长，洗完用大毛巾擦完，还得用吹风机吹干，洗一次澡总得用半天工夫。

咪咪当然对它的爸爸妈妈更亲热一些，当他们备课时，它就蜷伏在他们的怀里或书桌上，但当它爸爸妈妈上班的时候，它也会跑到我的屋里，在我床尾叠起的被子上，闻来闻去，然后就躺在上面睡觉，有时会跳上我的照满阳光的书桌上，滚来滚去，还仰卧着用前爪来逗我。

只有在晚上大家看电视时，只要吴青把它往我怀里一推，它就会乖乖地蜷成一团，一声不响地睡着，直到它妈妈来把它抱走。

咪咪还有点“人来疯”，它特别喜欢客人，客人来了，它总在桌上的茶杯和点心之间走来走去。客人要和我合影时，陈恕也总爱把它摆在我们中间。因此咪咪的相片，比我们家第三代的孩子都多！

咪咪现在四岁多了。听说猫的寿命一般可以活到十五六岁。我想它会比我活得长久。

1988年10月28日阳光满室之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东方纪事》1989年第2期）

痴人说梦

我几乎没有一夜不做梦。

我记得西方有位作家说：旅行了几十年的人，他的手提箱上重叠地贴上了许多旅馆的商标纸。最下面的是永远也揭不下来了。人的脑子也一样，最先留下的印象也是永远抹不掉的，总在梦中重复出现。

我的梦里的人物，都是七八十年前的我的父、母、弟弟、师、友……醒来涌上我心头的，是龚定庵的诗“……忧患稍稍平，此心即佛者，独有爱根在，拔之暴难下，梦中慈母来，絮絮如何舍”。

昨夜又梦见我回到美国威校宿舍“娜安壁迦”楼去——其实这座楼早已拆掉了——我住的却是一间三角形的屋子。我说：这间屋子虽然窄小，却离慰冰湖最近，还同美国同学争了半天！

最近七八年来，寸步不离的美国朋友送我的“助步器”，和常在我书桌上打滚的咪咪，却从来没有入

梦。我在梦中虽不是健步如飞，却也来去自由。从容地游山逛水。而跳到我书桌上的不是咪咪，而是我母亲所喜爱的那条花白长毛的“北京狗”！

1988 年 10 月 31 日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散文世界》1989 年第 1 期。）

一颗没人肯刻的图章

我每天都会得到一两封信，而每当“作协”的信使来时，更会得到一大捆小朋友的信，这些信有的是从同一个小学校来的，大概是这班小朋友在课本上读到我的一封《寄小读者》，于是老师就让他们来写回信。总之，无论是老、中、青或小朋友的信，信末总是祝我“健康长寿！”

我活了八十八岁，寿是不短了，但是健康呢？

我不能和健康的老人一样，不用说国内国外地旅行访问，就连“闲庭信步”也做不到。八年前我的右腿摔折了，虽然做过手术，但仍只能扶着“助步器”，至多到隔壁我的小女儿住的单元去坐一坐。每月到医院检查时，是要下楼坐车的，也是靠我的外孙或司机同志背我下楼，再塞进汽车里。总之，我是个废人！

每天，天还未明，我就醒得双眸炯炯了，我一想到又得过一天“废人”的生活，就恨不得甩掉这一个

沉重痛楚的躯壳！

但是我的儿女们和大夫们还千方百计地保我“永远健康”！

可见甩掉一个躯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想起至圣先师孔子有过一句“骂人”的话：“老而不死是为贼”。

我就想刻一颗“是为贼”的闲章来嘲弄自己。

我请了一向替我刻闲章的朋友王世襄，他笑着摇头不干！我又请别的许多朋友，他们也都是笑着摇头。我只好请我的老朋友胡絮青大姐去请一个职业的刻图章的人来做这受酬的工作，没想到她倒请到了一位王老先生替我刻了，还亲自送来。我真是喜出望外。

现在这颗闲章，已经用过几次了，是几位年轻的朋友，向我索赠近作的时候，在书上印上了我的所有的图章，其中自然也包括所有的闲章，“是为贼”是最后的一颗！

我替团体或个人题字的时候，却从来不用它，因为这颗图章，“不恭”的意味太重。

1988年11月6日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散文世界》1989年第1期。）

致 宫 玺

宫玺同志：

《中国散文诗一百篇》两本及信已收入，谢谢。有工夫好好看看。

您爱人的病如何了？为什么没有提及？希望她早日康复。我很好，勿念，祝好！

冰 心

十一、七、一九八八

致 葛 翠 琳

亲爱的翠琳：

你的热情洋溢的信早收到了。你的两个“研究会”，都已组成，且得到各方面的赞助，这都是精力旺盛的你的努力结果，可喜可贺！“冰心儿童图书奖”，可有可不有，不必为此费太多心思，韩素音和我本来约好，因那天我去医院查体，回来累了，和她另约，她又必须第二天走，终未见面，为憾！今天立冬，我楼早已有暖气。

祝好！

冰 心

十一、七、一九八八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致 王 安 忆

亲爱的安忆：

那么大的一张稿纸只写几个字，可是我把你的散文集《向日葵》看完了，多好的一本书，把你的生活和思想都写进去了，我本来就喜欢散文不修饰，想到那里写到那里，从里面我还认识了你的父亲。

我的病早就好了，不必挂念，北京虽冷，但阳光好，暖气热，我没有穿棉衣。你母亲好吗？请代道念，祝你小夫妻百年偕老！

冰 心

十一月十三日一九八八

无土则如何

前几年，不少领导人常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其后，又有人加了一句：无兵不安。这些话都对，概括得也非常准确。可惜尚缺一个重要方面——无土怎么样呢？

土，就是知识、文化、科学、教育，就是知识分子、人才。

几个月前，我曾向一些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后来有的报刊将我这问题公开发表了。我想，发表也好，让社会上各方有识之士来一起思索吧。

果然，半个月中，我就收到有全国政协转来三封信件，就是“无土则如何”的回响。即使是微弱的回响，也比石沉大海要好。恕我没有征求他们的同意，将三封信的内容摘录如下。因为我觉得信虽是写给我个人的，而谈论的却是全社会、全民族所关心和应

该关心的大事。

江西南昌油脂化工厂陈水根的信中说：

“我个人认为答案应是无土不兴。兴者，旺盛之谓也。‘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同样，没有文化的群体是愚蠢的群体。无土，我们的事业就不会兴旺发达。

“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接触的是大众的实践。我认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是不可思议的。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吃亏在文化素质低的例子俯拾皆是。您老知道的比我更多（这倒未必。——冰心注）。这要引起领导们的重视。尤其是决策者的重视，要把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议议。

“任何民族都需要有一精神支柱，尤其是当今改革开放的时代，尤显重要。这支柱的建造需要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与道德修养凝聚。舍此别无他路。因此，要重视文化知识，重视道德修养，重视知识分子、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是势在必行、理所当然的事。”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求是新能源研究所杨俊宇同志信中说：

“目前我们国家正在进行四化建设，目的是要建成文明昌盛的国家。否则，我们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了。因此，我悟出了你所提的问题的答案，这

就是‘无土不昌’。加上这句，就完整了。是否有当，请您及政协委员们给以指正。”

四川成都 513 信箱余人同志对这个问题更作了详尽的阐述。他说：

“士者，知识分子也。它是和知识、科学、社会文明紧密联系的代名词。中国要富强，中华要振兴，一要靠民主，二要靠科学。但归根到底是要靠科学。因为民主也是一种科学，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一切事物，党也好，政也好，农也好，工也好，商也好，教也好，如果违背了科学而行事，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产生阻碍社会发展的破坏力量。很难想象，在一个文盲充塞、科学文化落后、社会道德水平低下的国度能建设现代化的国家。靠缺乏教育和文化修养的人不能搞好现代化事业；靠杂乱无章的管理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新秩序；靠投机诈骗、阿谀奉承、以权谋私之徒，只能搞乱整个社会。这是再明显不过的道理。我们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还处于落后地位，究其原因，不是因为懒惰，也不是因为贫穷，而是长时期缺乏民主和不重视科学所造成的恶果。缺乏民主制度和民主观念，必然阻碍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科技落后、文化素质低，社会生产力低下，又维持了不民主制度的延续。如此恶性循环，就使社会停滞不前。

“要促进民主化进程，促进科学技术发展，首先就要培养更多的士，造成更多的有用之材。而教育，又是振兴中华的基础工程，切不可认为办教育不但不赚钱、反而花大钱而丢了这项千年大计的根本，去办那些急功近利的蠢事；更不要只把重视教育挂在口头上，写在文件中，而不去办一件两件实实在在的事。

“所以，对冰心老前辈所提问题，我这个后生小子的答案，只有一句话：无士不兴！”

他们三位身在天南地北，却不约而同地说了同一个意思。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也似乎无需再多说什么了。我只希望领导者和领导部门谛听一下普通群众、普通知识分子的心声，更要重视“无士”的严重而深远的后果。“殷鉴不远”，只要回想一下十年大乱中践踏知识、摧残知识分子、大革文化命所造成的灾难，还不清楚吗？

岁月易得，“五四”运动70周年就在眼前。七十年前，一批思想界、文化界的先锋人物，于国事螭螭之时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向封建势力、军阀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冲击，揭开中国的现代史页。时隔七十年，我们今天还是要大声疾呼：要让德先生、赛先生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不重视“士”，不重视科学、教育、文化，德先

生和赛先生就成了空谈，现代化也会流于纸上谈兵。

1988 年 11 月

（本篇最初发表于《散文世界》1989 年第 4 期。）

郑 振 铎

他是我在“五四”时期最早认识的人

他是给我介绍最多朋友的人

他是藏书最多的人

在我病中他是借给书最多的人

他是让他的女儿叫我做“干娘”的人

他是我的朋友中死得最仓猝的人

他是我和文藻常常悼念的人

他是中国的爱国的文化人可永志不忘的人

冰 心扶病书

戊辰大雪之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88年12月17日。)

一个充满了力量的汉字

我近来往往在天还没亮时就醒起了，这时周围沉黑，宇宙间没有半点声息！

真是“万籁无声”！

从这一句里，我心头涌上许许多多的“万”字。

我惊奇地发现：中国文字中的“万”字有这么大的惊人的魅力，它的覆盖面之大，之深，是无与伦比的。

我首先想起的是古人的诗句——我往往只记得诗句而忘了诗人的名字——如：

独立中流喧日夜

万山无语看焦山

这把焦山写得何等挺拔、何等声势？大有“万笏朝天”的意味了。

又如咏牡丹的诗句：

十里散香酥地脉
万花低首避天人

又把牡丹写得何等端严，何等艳丽！

唐诗人李白有：

五花马 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消万古愁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上两句写的是他的无聊、落魄；下两句写的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之急，之快。而两岸猿声又一直伴随着他的无限的离愁。

唐诗人杜甫的：

花近高楼伤客心
万方多难此登临

说的是当时天下动乱的情景，又如：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那就是因自己的贫寒，而想到天下的无可庇风雨之茅屋的寒士，真是“仁人之心”。

清诗人龚定庵有：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他要叫唤出九州风雷，请老天抖擞精神，不拘一格地降下许多可用的人材。

他却也有缠绵悱恻的句子，如：

万种温馨何用觅
枕上逃禅 遣却心头忆

古人的反战文字，如李华的《吊古战场文》：

秦起长城，竟海为关，荼毒生灵，万里朱殷

就比西方人因从月球上能看到中国的万里长城而倍加称道的，“人道主义”得多了。

昔人诗里的：

磧里征人三十万
一时回首月中看

写的就是三十万征人心中的“厌战”情绪，至于花蕊夫人的：

四十万人齐解甲
更无一个是男儿

就是一位女强人刺向“投降者”的一把匕首了！这时窗外已经出现了曙光，我对于“万”字的思索暂时被打断了。而我心中的这个充满了力量的“万”字，是不到我自己“万念俱消”，“万缘俱断”的时候，是决不会泯灭的！

1988年11月25日晨急就

（本篇最初发表于《散文世界》1989年第2期。）

埋在记忆最底层的一本书

前天半夜醒来，眼前忽然摊着一个打开的薄薄的本子，是我几十年来从未想到也未曾再看到的《烧饼歌》又名《推背图》（“推背”两字不知什么意思），这是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军师刘基的一段谈话，和刘基说的一些对于天下事的预言，是我在一九一一年从烟台回到福州路过上海时，从大人那里看到的，是当时极为抢手的一本书！

开头是讲朱元璋咬了一口烧饼，看见刘基来了，便把它盖在碗下，请刘基猜里面是什么东西，刘基说：“半似日兮半似月，曾被金龙咬一缺，这是一块烧饼。”以下便是朱元璋请刘基算一算将来的国运，刘基的回答，全是七个字一句的，从朱元璋以后几代的明朝皇帝一直讲到清朝的光绪和宣统（他的每句话虽极“模糊”，但是下面都有注释，也不知是谁加的。底下又说了一大段话，如“得见金龙民心开，刀兵水火一齐来，××××××××，父死无人兄弟抬”，

至此朱元璋问：“胡人至此尚在否？”刘基说：“胡人至此亡之久矣，”底下还有许多没法子解释的话，最后是：“适有异人自楚归，马行千里寻安歇……除暴安良民多谷，安享九州金满赢。”

这是一九一一年的事了，“辛亥革命”这“革命”二字，是当初许多愚昧无知，数千年习惯于封建制度之下的民众，所不能了解的，这种像算命一样的书，便应运而生了。

天快亮时，我忽然想到最后四句话的头一句，所谓“异人自楚归”，楚是湖南，这位异人是不是指的毛泽东主席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在举国纷乱中成立了么？说来也真巧！

我写下了这一段，是想说明人的头脑，是个最奇怪的东西，在毫无联想之中，忽然浮现出一本几十年来早已忘却而且是当时看后就一笑置之的无聊的书。

和我同年龄的人不多了。这些少数的同龄人之中，不知有多少人看过这本书？现在当然是找不到了，八十年代尊重科学的中国人民更不会去找，也更不必去找它！